



经学和经学史

周予同 原著

朱维铮 编校

经学和经学史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经学和经学史/周予同原著;朱维铮编校.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ISBN 978-7-208-10765-6

I. ①经… II. ①周…②朱… III. ①经学—历史—中国—文集 IV. ①Z126.2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06819 号

责任编辑 田芳园
封面设计 储平
技术编辑 伍贻晴

经学和经学史

周予同 原著 朱维铮 编校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35×965 1/16 印张 14.25 插页 2 字数 213,000

2012 年 6 月第 1 版 201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4,250

ISBN 978-7-208-10765-6/·K1887

定价 32.00 元

编校说明

朱维铮

本册辑入周予同先生关于中国经学史学的论文杂著，凡二十篇。

我曾介绍，周予同先生的学术取向，由教育学转向兼治中国经学史，始于一九二四年，当时他年仅二十六岁。那以后，他在两个领域，都有卓越的建树。但他在教育学和中国教育史方面的研究，尚待清理。而辑入本册的论文杂著，则较集中地映现这位中国经学史学科的现代开拓者的足迹。

由于我在一九八〇年编成初稿的《周予同经学史论集》(原名《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三版改今名)，已属编年的文集，因而本册所录论文杂著，就改为分类编排，以便阅读。

第一类五篇，主要涉及经学史的基本概念的界定。周予同先生从事经学史伊始，便反对概念的混淆。他总批评经史不分，儒学与经学不分，经学与经学史不分。他在一九二八年同时刊行的《经今古文学》和《经学历史》注释本书，就在清理“经”、“经学”、“经学史”三个基本概念的历史性方面，作出示范。他从批判清末皮锡瑞《经学历史》混淆经学与经学史的分野入手，回溯到两千年前“儒术独尊”那时起，中世纪经学便以学派的历史纷争，表明它从未实现一统。他直到“文革”前夜被自命阶级斗争“红线”表征的某些学丐诬为尊孔派，仍然坚持己见。

第二类六篇，都作于周先生中青年时代。依文章发表的时序，可知周先生由现代教育研究，转向抨击现代官方经学，直接原因在于由民国以后袁世凯到蒋介石历届政府不断提倡的“读经”。周先生在民国元年教育总长蔡元培废除全国学校“读经”年方十四岁。此后直到二十一岁与北京高师同学匡互生共同“火烧赵家楼”，预示他两年后走向社会，必定成为传统

经学的叛逆。果不其然，当三年后周先生开始著文批判儒家，再过两年，他年方“而立”，便发表名文《僵尸的出祟——异哉所谓学校读经问题》，矛头直指北洋政府教育总长章士钊，特别猛烈抨击章士钊伙同段祺瑞制造的枪杀和平示威的女学生的“三·一八惨案”。从此周先生便走上了否定中世纪经学的不归路，也由此开创了批判中世纪经学的经学史现代研究。

第三类八篇，著文跨度近五十年。周先生年过三十便担任大学教授，为使青年学子免受传统经学毒害，讲学特重揭露神学化的经学迷信，表示对于《古史辨》派同情的了解。时过一纪，周先生主编新编《辞海》的经学史部分，为澄清自延安时代到“史学革命”以来种种极左反历史谬说，将自一九五九年起在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专门化开设中国经学史课程讲稿形成论文，陆续刊布。作为周先生的学生和助手，我得以目睹周先生的大量手稿，每为先生在学生整理的稿件上面以红笔改得密密麻麻的手迹所感动。由先生示我的经学史论稿，获见先生改动部分均在八成以上，因而在当年《文汇报》、《学术月刊》、《新建设》等报刊发表的论文，署名均列先生在上海历史研究所的另一助手，甚为感动，以为先生提携后进不遗余力。没想到“文革”后我受命编校《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收入我曾见周先生定稿的七篇论文，竟招致周先生列为第二作者的助手控告。害我不得不尽力搜集反正，证其诬陷。然而终于昭雪，周先生已去世，而我编校的《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也由生著化为遗著。

本册第三类八篇。因为周先生从来重视中世纪经史相关度，而早年又同情疑古精神，所以周先生直到接近晚年，还认定汉初的经今古文学的分野，仍属剖判自汉至清经学变异的历史尺度。他的历史陈述，或可再酌，但他昭示的经学史研究应首重历史，不可以意识形态当作衡量尺度，却属不易之论。

早在抗日战争初期，周予同先生身居上海“孤岛”，便致力于表彰传统史学。在周先生看来，“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必先表彰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周先生自认是浙东学派的改造者。在他看来，任何对于经史传统的批判，都有利于否定过时的传统。周先生也因而致力于厘清经学与经学史的相异传统。

在周先生看来，中世纪的经学和史学，原属孪生兄弟，理念称经，流变称史。因而晚清章学诚所谓“六经皆史”，也可倒过来说正史皆经。于是周

先生特别重视中世纪传统史学向近代性新史学的变异过程。

题作《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的长篇论文，可谓明末清初到清末民初三百年中国史学史的概述。由明末到清末，中国经史学说的进化表征，不在官学而在民间，尤其在那三百年的东南民间。因而所谓乾嘉史学，实为十七世纪传统经学怀疑论的延续。伏处江浙的经史学者，段钱王赵等，无不转向考史以代解经。那以后经学与史学渐趋不分，如章学诚所谓“六经皆史”。然而号称孔门代代相传的儒家经典，真可视为由周公到孔子的古典史记吗？由清代汉学的文献研究，到民初考古的文献研究，早就得出否定性结论。周先生这篇史论，时过六十五年，仍使文史学者读来感到新鲜。那是文章的魅力呢，还是时空的错位？也许在彼不在此。

在我看来，经学既不等于战国以来的民间儒学，更不等于孔子祖述周公的原始儒学。它是秦汉间出现的统治学说新形态。它的先驱叔孙通，在秦末汉初“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谀以得亲贵”，从而在汉帝国成为首出“儒宗”，正开创了中世纪经学所谓古为今用的传统。从董仲舒、公孙弘，到郑玄、王肃，到刘炫、孔颖达，到韩愈、王安石，到程颐、朱熹，乃至王守仁、李光地，经学的理论形态各异乃至非常不同，本质无不为权力统治现状的辩护论。表征权力现状的“君人南面之术”，因族类、地域、阶层及传统宗教等等因素，而彰显时空形态的不同，于是中世纪经学，形态表征为“学随术变”，而所崇儒家经典及其官方诠释，与时俱变，也毫不奇怪。

由本册诸篇所示，周予同先生的中国经学史研究，出发点从来在于现状的批判，归宿总在于揭示课题指涉的历史实相。这当然是经学史研究的一种启迪。

2007年7月27夜

目 录

经学史与经学之派别——皮锡瑞《经学历史》序	1
一 经学的三大派	1
二 经学史的重要性和它的分类	3
三 皮锡瑞传略	5
四 皮著《经学历史》略评	7
附录	9
《经学历史》注释本重印后记	13
“经”、“经学”、经学史——中国经学史论之一	15
什么是“经”？	15
什么是“经学”？	19
中国经学史研究的特点	20
中国经学史的研究任务	22
关于中国经学史中的学派问题——中国经学史论之二	24
中国经学史中的“学派”	24
学派的阶级性和继承性	26
旧“学派说”批判	30
有关中国经学史的几个问题	36
一 经、史关系问题	36
二 对王肃和“王学”的估价问题	38
三 关于乾嘉学派问题	40
四 关于师法和家法问题	41

僵尸的出祟——异哉所谓学校读经问题	44
对于“读经”问题的意见	54
儒家之精神的社会政策	57
一 赘言	57
二 释题	59
三 例证	60
四 批判	65
道儒的党派性	68
一 六家	68
二 道家的党派性	69
三 儒家三派说	69
四 不可用道儒作宣传幌子	71
我们的时代	72
怎样研究经学	78
治经与治史	84
顾著《古史辨》的读后感	89
博士制度和秦汉政治	96

王莽改制与经学中的今古文学问题	114
从顾炎武到章炳麟	124
章学诚“六经皆史说”初探	136
孙诒让与中国近代语文学	149
康有为与章太炎	167
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	169
一 追念黄宗羲、钱大昕和章炳麟	169
二 新史学转变的文化动力	172
三 论史观派和史料派	173
四 《天演论》与《孔子改制考》	176
五 崔适的《史记探原》	179
六 夏曾佑的《中国古代史》	181
七 梁启超促史学脱离经学羁绊	185
八 胡适使史学完全脱离经学独立	188
九 考古派修正疑古派的研究方法	192
十 释古派的崛起与分裂	197
十一 “七七事变”与新史学趋势	200

经学史与经学之派别*

——皮锡瑞《经学历史》序

一 经学的三大派

皮锡瑞《经学历史》是经学入门书籍，可以说是“经学之导言”；本篇的任务，在介绍《经学历史》于读者之前，那不过是“经学导言之导言”而已。然而因为是经学导言之导言，所以不能不对于经学先作鸟瞰的说明，以便显出经学史的重要性和本书的价值。

中国经学，假使我们慎重说，上追到西汉初年为止，也已经有二千一百多年的历史。这二千多年中，经部书籍，因为传统的因袭的思想关系，只就量说，也可以配得说“汗牛充栋”。不说别的，我们只要一看纳兰性德汇刊的《通志堂经解》，阮元、王先谦汇刊的正、续《清经解》，也几乎使你目眩；至若列举朱彝尊《经义考》的书目，那真所谓“更仆难数”了。但是，假使我们能够应用史学家处置史料的手段，这许多繁重的著作，也不过可以归纳为三大派，所谓“经学的三大派”。这三大派都显然自有它的立场和特色；就我的私意，可称为一、“西汉今文学”，二、“东汉古文学”，三、“宋学”。

* 本篇是著者为清皮锡瑞《经学历史》注释本写的序言。一九二八年在《民铎》杂志第九卷第一号初次发表时，著者有如下附记：“客岁，商务印书馆为初治国学者计，汇选入门书籍暨重要著作若干种，施以标点注释，冠以序言，总名为《学生国学丛书》；而皮锡瑞之《经学历史》即为其一。皮书之标注，由余承任；书成，石岑兄请以其《序言》先刊载于《民铎》杂志；余以肤浅辞谢。石岑兄谓：是篇叙述经学流别，足以矫正学术而不明门径者之弊；而纠正谬误观念，于时下思想界亦颇有影响。余勉允之，然中心殊未安也。”关于注释本的撰写和修订，参见本书所选《〈经学历史〉注释本重印后记》。初稿内有著者关于经学史研究的计划，后在注释本再版时删去。现附录于后，供参考。——编者注

西汉今文学发生在西汉，就是所谓“今文十四博士”之学。在西汉时代，因为统治阶级的利用和提倡，在学术界几有独尊之势。后来因为古文学的暴兴，和郑玄、王肃的混乱家法，便渐渐的衰落。延到曹魏、西晋，因为政乱和胡祸的过烈，连仅存的章句传说也多随兵燹而渐灭。一直到了清代的中末叶，因为社会、政治、学术各方面趋势的汇合，于是这骸骨似的今文学忽而复活，居然在学术界有“当者披靡”的现象。当时所称为“常州学派”、“《公羊》学派”，就是这西汉博士的裔孙。现在清朝覆亡已十六年，但这今文派的余波回响仍然在学术界里存在着，并且似乎向新的途径发展着。

东汉古文学，稍为缜密地说，可以说是发生在西汉末年。到了东汉，因为今文派自身的腐化和古文学大师的努力，大有取今文学而代之之势。郑玄、王肃虽说混淆家法，但究竟左袒古文学，所以魏、晋时代，今文学亡灭，而古文学反日趋于发扬开展。后来六朝的南北学，隋、唐的义疏派，虽然虚实繁简不必尽同，但立场于古文学却无差异。一直到了北宋庆历以后，经学上的怀疑学派——宋学——崛起，于是这正统派的古文学暂时衰歇。但明代末期，因为姚江学派流于虚妄，和清廷思想压迫政策的实现，于是顾炎武扛了“舍经学无理学”的大旗来复兴古文学。清代三百年学术界的权威，便被这一派所独占；所谓以惠栋为领袖的“吴派”和以戴震为领袖的“皖派”，都同东汉古文学有着血统的关系。

宋学的怀疑精神，唐代经师如啖助、赵匡、陆淳辈已开端绪；但这种风气的盛行，却不能不说在北宋庆历以后。到了南宋，因为研究方法的不同，虽可分为以朱熹为领袖的“归纳派”，以陆九渊为领袖的“演绎派”和以叶适、陈傅良为领袖的“批评派”三派；但前二派立足于哲学的见解，以理欲心性为论究的对象，而借助于经学的解释，却并没有不同。元、明以来，归纳派的朱学，因为朝廷的提倡，侥幸地取得正统的地位；而演绎派得王守仁（阳明）生力军似的加入，也颇能得天才的学者们的信仰。但这两派都是假借经学以言理学，结果所谓“尊德性”的固然流于禅释，便是所谓“道问学”的也空疏无物。于是元、明二代成为经学史上的衰落时期，而东汉古文学便乘之而复兴。

上文“经学的三大派”说，自然是极其粗枝大叶的叙述；假使详密的观察，不仅清代复兴的古文学同东汉原始的古文学不同，清代复兴的今文学同西汉原始的今文学不同，元、明的宋学与北宋的宋学不同；就是各派自

身的流别,以及学者自身思想的变迁,都须加以烦琐的说明;但这决不是这简短的篇章所能容纳了。这三派的不同,简明些说,就是今文学以孔子为政治家,以六经为孔子致治之说,所以偏重于“微言大义”,其特色为功利的,而其流弊为狂妄。古文学以孔子为史学家,以六经为孔子整理古代史料之书,所以偏重于“名物训诂”,其特色为考证的,而其流弊为烦琐。宋学以孔子为哲学家,以六经为孔子载道之具,所以偏重于心性理气,其特色为玄想的,而其流弊为空疏。总之,三派固各有其缺点,亦各有其优点。我们如果说,因经今文学的产生而后中国的社会哲学、政治哲学以明,因经古文学的产生而后中国的文字学、考古学以立,因宋学的产生而后中国的形而上学、伦理学以成,决不是什么武断或附会的话。

最后还须附带说明的,就是:关于经学的分派,前人有采二派说的,有采四派说的,我个人觉得都不尽妥善。二派说可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为代表;它以为:“自汉京以后,垂二千年,……要其归宿,则不过汉学、宋学两家互为胜负。”〔一〕其后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宋学渊源记》〔二〕、阮元《国史儒林传序》〔三〕都取这说。其实他们所谓“汉学”,是专指东汉古文学,并不包括西汉今文学。这样,不正是截去经学史的首尾吗?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前序说:“凡后世所指目为汉学者,皆贾、马、许、郑之学,乃新学,非汉学也。”这种讥评的话也确有一部分理由。采取四派说的是近人刘师培。刘在《经学教科书》〔四〕序例中说:“大抵两汉为一派,三国至隋、唐为一派,宋、元、明为一派,近儒别为一派。”这话也很有商榷的余地。宋、元、明固自为一派,两汉及近儒不都是含有互相水火的古今文学两派吗?三国、隋、唐不就是古文学的支流吗?刘氏所以有这样的话,或者是强以时代分派的缘故。

二 经学史的重要性和它的分类

上文叙述经学的三大派,其目的不过在给读者以经学上的简明概念,以为进论经学史的预备而已。

中国经学研究的时期,绵延二千多年;经部的书籍,据《四库全书总目》所著录,已达一千七百七十三部,二万零四百二十七卷〔五〕;但是很可奇怪的,以中国这样重视史籍的民族,竟没有一部严整的系统的经学通史。自

然,经学史料是异常丰富的,广义的经学史或部分的经学史也不是绝无仅有;但是,如果说到经学通史,而且是严整点系统点的,那我们真不知如何回答了。皮锡瑞的《经学历史》、刘师培的《经学教科书》第一册,固然不能说不是通史;但是以两位近代著名的经今古文学大师,而他们的作品竟这样地简略,如一篇论文或一部小史似的,这不能不使我们失望了。最近日人本田成之撰《支那经学史论》,已由东京弘文堂出版。以具有二千多年经学研究的国度,而整理经学史料的责任竟让给别国的学者,这在我们研究学术史的人,不能不刺骨地感到惭愧了。

况且,就是撇开这种感情的话,而只就中国其他学术的研究而言,经学通史的撰述也是决不可少的。我们研究古史学,我们能不取材于《尚书》、《左传》、《周礼》等书吗?但一谈到这三部书,《尚书》的今古文成问题,《左传》的真伪成问题,《周礼》是否为实际的政绩的记载成问题。我们研究哲学史或思想史,我们不能不论到《易》和《春秋》,但《易》的产生时期和思想来源成问题,《春秋》的笔削命意和《公》、《穀》、《左氏》的异同成问题。我们研究古代民间文学,当然首及《诗经》,但《关雎》等篇的美刺成问题,《静女》等篇是否恋歌成问题。最后我们说到古文字学的研究,则六书的起源,壁中古文的真伪,籀、篆、隶的变迁,无一不成问题,也无一不同经学发生密切的关系。至于将来比较宗教学、民俗学等的研究,那不仅应当探究《易》、《礼》的原始意义或背景,就是举世斥为妖妄怪诞而同经学有关的谶纬,也是绝好的资料。但是说,要研究哲学、文学、史学、文字学等等的学者都先要向经学下一番苦功,不是太不经济吗?不是太不了解学术分工的作用吗?所以我说,在现在,经学之继承的研究大可不必,而经学史的研究当立即开始。因为它一方面使二千多年的经学得以结束整理,他方面为中国其他学术开一条便利的途径。

我这样热望着经学史的产生,或者会引起一般随俗者的误会。自然,我是十分清楚的,现在时行的口号是“打倒孔子”、“废弃经学”;但是我所不解的,是他们打倒和废弃的理由不够充分,不足以服顽旧者的心。我原是赞成“打倒”和“废弃”的,但我自以为是站在历史的研究上的。我觉得历史派的研究方法,是比较的客观、比较的公平;从历史入手,那孔子的思想和经学一些材料不适合于现代,不适合于现代的中国,自然而然地呈献在我们的眼前。我们不必高呼口号,而打倒和废弃的理由已了然于胸中。所以

我们就是反对经学之学术史的研究，而只是立足于致用的、功利的观点，那经学史的完成也似乎是现代的工作之一。

经学史的需要既如上述，但在中国旧有的著述中，经学通史又这样异常缺乏；所以我们现在只得将它的范围放宽些，以寻求性质相近而较有价值的著作。这种著作，大概可分为三类：一、以经师为中心的，例如胡秉虔的《西京博士考》〔六〕、张金吾的《两汉五经博士考》〔七〕、王国维的《汉魏博士考》〔八〕、江藩的《国朝汉学师承记》、洪亮吉的《传经表》、《通经表》，以及各史的《儒林传》或《儒学传》等属之。这类著作的缺点：第一，每每是断代的记载，不能看见经学的整个趋势；第二，每每偏重个人的成就，而抹煞某一时代的全体表现；第三，甚至于仅有姓名而没有事实，或附以极简短的小传，大有“点鬼簿”的形式。二、以书籍为中心的，例如朱彝尊的《经义考》、翁方纲的《经义考补正》、郑樵《通志》的《艺文略》、马端临《文献通考》的《经籍考》、《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经部，以及各史的《艺文志》或《经籍志》的经部属之。这类著作的缺点，大致同前者相同；虽然大多数不是断代，但不能表示经学的整个趋势却是一样。三、以典章制度为中心的，例如顾炎武的《石经考》、万斯同的《石经考》、杭世骏的《石经考异》、王国维的《五代两宋监本考》〔九〕都是；在古代，选举、学校同经学也颇有密切的关系，所以《通典》的《选举门》、《通志》的《选举略》、《文献通考》的《选举考》、《学校考》也属于这一类。这类著作的缺点，是每每罗致若干史料，加以排比，而不能显出这种典章制度在经学上的前因后果和其相互间的关系。总之，想真切了解经学的变迁，以上三类书籍只能作为补助的或分门的参考资料，而仍有待于经学通史。因为这种原因，所以这样简略的皮著《经学历史》竟成为适应需要而另具价值的著作了。

三 皮锡瑞传略

在经学史这样需要而缺乏的时候，那皮锡瑞《经学历史》有一读的价值便了然可知了。现在在未谈到《经学历史》之前，请先介绍皮氏的生平和他的学术的大概。

皮先生名锡瑞，字鹿门，一字麓云，湖南善化人。他表示敬仰西汉《尚书》今文学大师伏生，署所居曰师伏堂，学者因称师伏先生。他早岁颇有经

世之志，留意郡国利病。光绪戊戌政变时，因为提倡新式学校制度，大受顽固派的疾视，甚至于斥为乱党，交当地地方官管束。皮氏治经，宗今文，但持论平允，没有康有为那样的武断，也没有廖平那样的怪诞。他所著的书，除《经学历史》以外，还有《易经通论》一卷，《书经通论》一卷，《诗经通论》一卷，《三礼通论》一卷，《春秋通论》一卷，总称《五经通论》；《今文尚书考证》三十卷，《古文尚书疏证辨正》一卷，《古文尚书冤词平议》二卷，《尚书大传疏证》七卷，《尚书中候疏证》一卷，《史记引尚书考》六卷，《礼记浅说》二卷，《王制笺》一卷，《春秋讲义》二卷，《左传浅说》二卷，《孝经郑注疏》二卷，《六艺论疏证》一卷，《郑志疏证》八卷附《郑记考证》及《答临孝存周礼难疏证》，《鲁礼褻袷义疏证》一卷，《三疾疏证》一卷，《圣证论补评》二卷，《师伏堂笔记》三卷，《经训书院自课文》三卷，《师伏堂骈文》六卷，《师伏堂诗草》六卷，《师伏堂咏史》一卷，《师伏堂词》一卷等。他的著作内容，虽没有很伟大的创见，如同时几位著名的经今文学大师；但学术门径很清楚，善于整理旧说；所以如《经学历史》、《五经通论》等书，对于初学者，真可称为“循循善诱”。他的著作，有师伏堂自刊本，多数由湖南思贤书局刊行，流传不很广。惟《经学历史》曾有上海群益书局铅印本和商务印书馆影印本。

因为皮氏是经今文学者，所以同时经古文学者都非难他。章炳麟在《文录》卷一《驳皮锡瑞三书》中讥斥得很厉害，陈汉章在《经学通论》〔一〇〕附录中也表示着不满意。陈氏所批评的话多属于小疵或补正，现在撮录章氏的话于下，以见清末今古文学派的争辩。章氏说：

“善化皮锡瑞尝就《孝经》郑《注》为之义疏，虽多持纬候，扶微继绝，余甚多之。其后为《王制笺》、《经学历史》、《春秋讲义》三书，乃大诬谬。《王制笺》者，以为素王改制之书，说已荒忽；然《王制》法品，尽古今夷夏不可行，咎在博士，非专在锡瑞也。《经学历史》，钞疏原委；顾妄以己意裁断，疑《易》、《礼》皆孔子所为，愚诬滋甚。及为《春秋讲义》，又不能守今文师说，糅杂《三传》；施之评论，上非讲疏，下殊语录，盖牧豎所不道。又其持论，多以《四库提要》为衡。《提要》者，盖于近世书目略为完具，非复《别录》、《七略》之侪也；其序多两可，不足以明古今文是非；锡瑞为之怩惑，兹亦异矣。……”

章氏是现代经古文学惟一大师，平素说经，反对刘逢禄、宋翔凤、魏源、龚自珍，又反对康有为、廖平，凡近代经今文学者，没有不受他的训斥；那他的呵诋皮氏为“牧竖所不道”，实毫不足怪。不过以我们第三者的眼光观察，除《春秋讲义》糅杂《三传》失了今文学者立场外，其余如主《王制》，以《易》、《礼》为孔子作，正是今文学所谓“微言大义”所在。至于引用《四库提要》，这也是不得已的办法，我们似应加以原谅。

我很惭愧，我所得于皮氏的生平，仅仅简略如此。他的生卒，他的师友，他的学术的传授，我竟无法查考。我曾辗转地询问几位湖南的学者，但不是没有回音，就是以“不知”答。当这样离乱的时候，大家救死惟恐不暇，谁能留意他们以为微末的事呢？据杨树达先生说，皮氏的弟子某君拟为他撰一年谱，我诚恳地希望着，希望他的年谱早日呈献于读者之前，而将我这简短疏略的小传舍弃掉。（按皮先生孙名振教授曾撰《皮鹿门先生年谱》，一九三九年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略见本书“附录”。）

四 皮著《经学历史》略评

我现在介绍皮著《经学历史》于读者，并不以为这本书是万分完善，毫无可议；在现在经学史这样缺乏的时候，无论如何，这本书是有一读的价值。我们读这本书时，第一，不要忘记皮锡瑞是经今文学者。因为他立场于今文学，所以他对于宋学是不满意的，更其是宋人的改经删经的方法；我们只要看他全书对于王柏的训斥，便可了了。又因为他立场于今文学，所以他对于经古文学也不表示绝对的崇信；他对于清代考证学的发展是相当地加以赞许，但他绝不以为是经学研究的止境。我们明了了这一点，则他所主张的《六经》断始于孔子，《易》、《礼》为孔子所作，以及其他排抑左氏、讥贬郑玄等等的话，都可以有一贯的解释了。第二，不要忘记皮锡瑞究竟只是一个经学家而不是史学家。因为他不是史学家，所以史料的搜集不完备，史料的排比不妥善，而且每每不能客观地记述事实，而好加以主观的议论。他这部书，假使粗忽的翻阅，似乎不能将经今古文学、宋学的发生、变迁、异同、利弊一一显示给我们。他不能超出一切经学的派别来记述经学，而只是立在今文派的旗帜之下来批评反对派。诚然，就经学说，他是没有失掉立场；但是，就史学说，他这部书就不免有点宣传的嫌疑

了。我觉得这部书的优点和缺点都不少,但是我不愿意在这简短的“导言之导言”中絮絮地谈论,更不愿因此给读者以批评的暗示。现在将这本书其他一切的优缺点让读者自己体味去,而只将我现在认为是荒谬的思想揭示出来。

皮氏作这本书的时候,正是今文学复盛的时候,因为时代发展的关系,颇有我们现在以为不对的地方。这在皮氏,自然深可原谅;但我们决不可因为重印这部书,而使这些荒谬的思想仍然流行着。

第一,我以为荒谬的,便是所谓“孔教救国”之说。孔子学说的真相究竟怎样;后世儒家所描写的孔子,后世君主所提倡的儒教,后世学者所解释的儒学,究竟是否是真的孔子,都是绝大疑问。在这步工作还没有完成以前,冒昧地将传统的因袭的孔教来治国,这简直是鬼话。皮氏在第一章中说:“后之为人君者,必遵孔子之教,乃足以治一国;……后之为士大夫者,亦必遵孔子之教,乃足以治一身;……此万世之公言,非一人之私论也。”今文学者尊崇孔子,以为他怀抱着伟大的政治思想,这在我是可以相当承认的;但不论时代,不论地域,以他主观所得的孔教印象冒失地应用着来拯救现世,这不是很危险的吗?

第二,所谓“六经致用”之说。经今文派以孔子为政治家,以六经为孔子政治思想所托,这话似乎有一部分理由,但已经有商榷的余地。不过今文学者每喜更进一步,探求“六经致用”的史例,于是对于西汉君主利用迂儒的策略,愚而且诬地在赞叹着仿效着。皮氏也不免陷于同一的错误。他在本书第三章中说:“前汉今文学能兼义理训诂之长,……其学极精而有用;以《禹贡》治河,以《洪范》察变,以《春秋》决狱,以三百五篇当谏书,治一经得一经之益。……汉学所以有用者,在精而不在博;将欲通经致用,先求微言大义。”这些论调,就我们现在观察起来,真有点非愚即妄。试问假使黄河决口了,你就是将《禹贡》由首一字背诵到末一字,你能像灵咒似的使水患平息吗?孔子和《六经》的相关度,以及《六经》和致用的相关度,不仅相去很远,而且根本上还是大疑问。所以现在就是研究经学,也只能采取历史的方法,而决不能含有些微的汉儒“致用”观念。

第三,所谓“纬候足征”之说。今文学家尊崇孔子为素王,所谓“无冕的帝王”;而且相信历代帝王欺罔民众的技术,以为帝王必有瑞征,于是孔子也有所谓“感生”,所谓“受命”,所谓“告成”〔一一〕,于是孔子不仅是政治家,